



□ 刘金源

洋务运动的马前卒

徐润

▲ 徐润

徐润的故乡在广东香山县。晚清的香山县是广州府属县之一，因靠近广州这个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得其地利之便，香山人便多从事海上贸易。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对外贸易专营权的丧失，广州十三行逐渐衰落，从中散出的人有不少依附于外商，成为中外商人的新型中介人——买办。因此，在广东香山形成了一批显赫的买办世家。其中有一些目光远大的人又将买办事业之基础瞄向更有广阔发展前途的上海，徐氏家族即是其中的佼佼者。香山县的徐氏家族、唐氏（唐廷枢）家族、郑氏家族等成为中国早期买办巨商的源头。

从学徒到买办，崛起上海滩

徐润祖籍在河南陈留，因遭元末之乱，其先辈辗转迁至广东香山县。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10月28日，徐润出生于香山县北岭乡，其父徐宝亭为他起名以璋，字润立。后改名润，号雨之，别号愚斋。

1852年，14岁的徐润由叔父徐荣村带至上海。为寻求功名，徐荣村将他送到姑苏西园继续求学。不料，因广州话与姑苏语相去甚远，数月下来，徐润非但读不

成书，连日常用语也不明白。一筹莫展之下，他只得悻悻返回上海，在伯父徐钰亭的安排下，进入英国大鸦片走私商颠地所创设的宝顺洋行当了一名学徒。

徐润进入宝顺洋行以后，徐钰亭即让他拜副买办曾寄圃为师，学习进出口贸易业务。曾寄圃颇有才干，不仅负责行中生意的经营，还要代表洋行结交官府。正是在曾寄圃的熏陶下，徐润学到了不少商业上的知识。

由于勤勉好学，徐润博得洋行上下的看重。19岁

那年他除了兼任丝、茶、棧务等职务外，已获准入上堂帮帐，24岁又升任主帐，督理各职。徐润升任主帐仅数月，副买办曾寄圃突然去世，洋行大班韦伯即让徐润接替曾寄圃担任副买办之职。韦伯对他说：“以后行中之事由君一手做去，惟老买办在行必须一一禀报。……今君乃总行中华人头目，如有差错捺报，惟君是问。”

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徐润就开始自营生意了。早在上堂帮帐的时候，徐润已经尝试自己经营商号，他先是同其师曾寄圃等合开一家绍祥字号，从内地收购生丝、茶叶和棉花，然后转卖给上海各洋行。这既为宝顺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自己又可以从中赚取差价，真是一举两得。接着，徐润在温州试办了一家润立生茶号。洋行出口茶叶，一般都是通过买办向上海的茶棧进货，茶棧的茶叶来自各地的内棧，内棧又是通过产地的茶行向茶贩或茶农购买毛茶（粗制茶），再加工后卖出，外商与茶农间隔着好几层环节。徐润接近产茶地区办茶号，这即便于掌握行情和茶源，同时又可将上海茶棧和内棧两个环节合二为一，减少层层分享赢利的状况，大大提高了利润。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徐润自营茶叶的信心也大增。他又陆续在江西的河口、宁州等地与人合股开设了福德泉、永茂、合祥记等茶号。源源不断的茶源除了满足宝顺洋行的需要外，还为其他洋行提供了货源，徐润则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徐润还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立顺兴、川汉等货号，除丝、茶外，还经营烟叶、皮油、白蜡、黄麻、白麻、桐油等，这些货都是外商所需要的品种。此外，他又在二马路（今九江路）一带与人合股开设宝源丝茶土号，经营丝、茶和鸦片。五口通商之初，首先进入上海的一批大商行中有不少如宝顺、怡和、旗昌、琼记等是以进口“洋药”闻名的鸦片走私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通过天津条约的签订，鸦片贸易在每百斤纳税银30两以后，就变为合法的商品，公开推销而畅行无阻。鸦片生意可带来巨额利润，由上海运到苏州就能提高4到5倍的身价，如此厚利驱使买办们也争做毒品生意。徐润在深入内地为外商组织货源的同时，当然也不会忘记乘机倒卖鸦片，以从中牟取暴利。

五口通商以后，商业的发展使得商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更加频繁。作为一种信贷机构，钱庄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连外商也认识到“接受期票支付货款，远比用卖了货的现款再来买货要能销出更多的货物”，所以洋行也普遍接受以庄票作为中国商人交易的结算工具。干

是买办们不失时机地纷纷投资自设钱庄，徐润又不甘示弱，先后和人合股开设了敦茂钱庄和协记钱庄，办理存放款、开发庄票和兑换等业务。这不仅赢得不少利润，也为自己生意上的资金周转提供了便利。

自15岁入行以来，徐润从每月领取10元薪俸的学徒，迅速擢升为大洋行的总代理人，手下领导着办房的全体职员和各分行的买办，经手着巨额的进口买卖；同时自己还先后经营着多家商号和钱庄，或独资，或合股；此外又购有不少地产，造房租收或做地产投机生意，徐润已俨然一上海滩上的买办巨商。

为了能够控制茶叶、生丝和鸦片贸易，维护自己的利益，徐润和他的同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唐廷枢等人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丝业公所和洋药（鸦片）局，徐润在这些同业公会中皆充任董事。买办巨商们首先控制了公所的领导权，然后通过公所的权势对上海和周围广大地区的丝、茶、鸦片贸易行业进行控制和垄断，操纵市场，谋取暴利，各口岸的公所“会同上海董事，互为维持”，洋行与同业公所之间则通过买办势力的中介而得到沟通。

虽然在洋场上徐润已是一个很有面子的大买办，但在科举制度仍在延续的清末，在官本位观念统治的封建社会，布衣商人纵有万贯财富和洋人势力之依托，在与官府打交道时，仍会有一种自卑感。自投身市井、依附洋商后，在险恶的商场竞争中，徐润深感仅仅依靠洋人的势力是不够的，还要设法结交官府，名义上有个一官半职，对付商场中的各种势力也就有利得多。所以，徐润在升副买办的第二年，就报捐了一个光禄寺署正的官衔，并报捐花翎，在上海皖营运输分局报捐一员外郎官衔。通过捐纳官衔，徐润在赚足了钱的同时，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1866年李鸿章调兵到浙江、福建镇压太平军余部，徐润用自己运输茶叶的船只帮助李鸿章转运粮饷和军械，从中出了不少力，受到李鸿章的赏识。经李鸿章向朝廷保奏，加徐润为四品官衔。

1867年，年近而立之年的徐润，已成为上海商界的知名人士。他拥有雄厚的资产，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通过蛛网般的商务关系掌握了广阔的市场和货源，并且和官场也有了一定的交往。在外商眼里，徐润是一位神通广大、能招财进宝的理想代理人；而在中国商人中，分享洋人权势、领导着同业公所、又有着朝廷品官名份的徐润也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

为李鸿章效力，创办招商局

1868年，徐润趁宝顺洋行股东拆股之机，离开了为之效力达十多年之久的宝顺洋行，开始独立经营茶叶生意。

上海开埠之初，由于广东的买办纷纷随东转移到上海，一时上海买办大半为广东籍，尤以香山人为多。后来浙江籍、江苏籍买办渐次挤入，广东买办在上海独占鳌头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增强广东籍商人在上海商场的竞争力，徐润和其叔父徐荣村、世交唐廷枢等联络广州、肇庆府籍商人，共同创立了广肇公所。徐润被推为广肇公所的财务主管。

洋务派自70年代由“自强”转向“求富”，除了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外，还开始创办近代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企业。187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筹建官办轮船招商局，欲购置先进的航运设备，发展近代航运业，与外商在华航运势力分利，开拓财源，以维持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李鸿章委派经办漕运的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负责筹建，奏请户部借款20万串制钱（约合银10万两）“示信于众商”，以期广招商股。

筹建轮船招商局，成败的关键在于资金的筹集。但在朱其昂的主持下，商人对官办轮运业难于信任，资本的招徕一筹莫展，到1873年正式开办，包括官款在内，招商局的资本尚不足20万两。迫不得已之下，李鸿章只得将招商局改为官督商办，提出：“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之风，渐收利权。”

为此，李鸿章选中了不仅自身拥有巨额资产，而且亲朋好友中亦多为买办富商，并在众商人中享有威望的唐廷枢和徐润，委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徐润为会办。李看重徐、唐，一方面是想利用二人在富商巨贾中的信用与号召力来召集商贾；另一方面是因为创办先进的转运营，在设备和技术等方面须依赖西方国家，而唐、徐的买办经历使其在会通中西上少有望其项背者。同时招商局今后的经营也需要其决策者具备管理近代企业的头脑和知识，而唐、徐在这方面也有着明显的优势。

徐润此时真是左右逢源，因为旗昌洋行也看中了他的才干和实力。美商旗昌洋行实力雄厚，是上海早期

的主要洋行之一。旗昌洋行竭力邀请徐润入行任买办，许以上海总买办之位，这的确是有诱惑力的。权衡再三之后，徐润婉言拒绝了旗昌的盛情，接受了创建中国第一家大型轮船航运企业的重任。徐润的这一考虑，除了顾及自身利益外，也有出自希望自己国家富裕、强大之意愿的一面。

唐廷枢和徐润一进招商局，即着手筹集资金，先是拟定招股100万两，每股100两。徐润本人首先附股，投资24万两。他又广招众亲友入股。唐、徐的入局和投资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普遍反响，入股者十分踊跃。100万两股金招齐以后，唐、徐决定再添招100万两。第二次招股，徐润本人又认股24万两，前后共计4800股，合银48万两。另外他招徕亲友入股共达五、六十万两，也就是说，由徐润一人经手召集的资金就占了招商局全部资本的一半以上。唐廷枢本人的投资和经手召集的资金也在招商局占有很大比重。

当时还是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也参与了招商局的筹办。盛宣怀的父亲盛康与李鸿章旧交甚厚，盛宣怀入李鸿章幕僚后也颇显才干，深得李鸿章信任和器重，不到两年他就升任知府、道员衔，获赏花翎二品顶戴。李鸿章创办招商局，盛宣怀意识到这是他欲成大事、晋升高官的良机。因为若将洋务企业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可以为日后的远大目标奠定雄厚的财政基础。故此在创办招商局过程中，盛宣怀竭力强调应该委派有官衔者主持招商局，并且积极展开了争取总办职位的活动。

总办职位的选任，在本意上李鸿章当然是倾向于盛宣怀的，但他考虑到盛在招股集资、经营管理诸方面尚缺乏才干，难以服膺众商董，所以只能让其屈居会办之职。但在专职的分工上，李鸿章颇费了一番苦心的：让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主管招股、揽载，让旧式商人出身的朱其昂、朱其诏两会办主管漕运，盛宣怀的职务虽仅为会办，但兼管揽载、漕运，显而易见他是要让盛宣怀发挥官督的作用。

唐廷枢、徐润强调要选在商民中威望高、招股多者为商董，每百股选一商董，商总于众董中选举产生。结果招商局的6个商董中有3个是买办出身：上海商董徐润、汉口商董刘绍宗、香港商董陈树棠；两人是官员：上海商董朱其莼、天津商董宋缙；另一汕头商董范世尧身份不明。加上商总唐廷枢，买办商人在招商局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唐廷枢、徐润一入局，就改变了朱其昂主持局务时

仅运漕粮、不揽客货的做法,明确规定:“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从而表明招商局的经营以揽载为主、揽载重于漕运,这对于招商局的日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876年,徐润与唐廷枢等人集资创办了仁和水险公司,后又开办济和水火险公司,徐润共投资15万两,这是中国保险业的开始。不久他们又将这两家公司转给招商局经营。1877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急于将一批旧船和在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栈房、码头拍卖,徐润代表招商局以220万两全部买下。此举使得股票正在下跌的旗昌公司起死回生,股票又迅速上扬。后来有人上奏,说徐润解外商之急,使其获得大利。此时,李鸿章出面庇护,称“利权可渐收回”,“大局转移,在此一举”,并称徐润是“殷实明干”的人才,才使徐润免遭厄运。此后,在徐润等人的苦心经营下,招商局的事业日益发展壮大,徐润本人也受到朝廷的赏识。1878年,湖广总督李瀚章以徐润办理漕粮海运出力为由,向清政府保奏加二品衔;两年后又经李鸿章保奏以道员本班尽先补用。

唐廷枢、徐润任招商局首领期间,招商局的发展势头甚旺。而且,自他们入局后,无论在官、商投资比重上,还是在用人和经营内容上,都是买办商人的势力占了上风,这使李鸿章官督商办的设想被淡化,后来称这个时期的招商局为商办时期。

与盛宣怀斗法,几度沉浮

李鸿章的门人盛宣怀想当督办的欲望迟迟不能实现,颇有怨言,于是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大肆诋毁唐、徐办事无能:“细审任事诸人,并不加意刻勉,反觉遇事疏忽。”特别是对实际掌握局务的徐润,盛宣怀的积怨日甚,他向李鸿章告状说:“职道在局除却为难之事,绝无一语会商。职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为难之事”当指筹款购买旗昌轮船公司之事。在写给徐润的信中,盛宣怀直接宣泄了其愤懑:他自嘲是“不谙商务之人空挂虚名”,抱怨“规并旗昌一切布置,均不及会商而已定”,又指责“欲妥筹整理,乃彼此均不能虚心采纳”等等。

糟糕的是,盛宣怀想排挤唐、徐未成,自己却在1882年因被弹劾在购买旗昌船厂时“扣帑入己”和“侵渔中金”而被迫暂离招商局。1884年,徐润也遭不测,他亏欠招商局巨款的行为东窗事发。

徐润一向热衷于房地产买卖,事发之前,他利用管理招商局财务之便,私自挪用了招商局16万余两巨额款项,以度过他本人生意上的危机。偏偏这年发生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恐慌,并波及到上海;中法两国又发生冲突,法国军舰驶抵上海吴淞口,扬言要进攻招商局,局势十分紧张,市民纷纷提款迁避,市面遽变,商号店铺接踵倒闭,钱庄歇业,上海市场银根奇紧,形成倒帐风潮。招商局的资金周转亦受到影响,徐润挪用公款之事便暴露出来了。

徐润东窗事发,正好给一直觊觎独掌招商局事权的盛宣怀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李鸿章派盛宣怀到招商局查处整顿这件事,盛宣怀对此良机自然是额首称庆了。他一到招商局便乘隙大做文章,他不顾徐润经营招商局10年来实力大增、赢利104万两的主要功绩,而向南、北洋大臣报告说:招商局“根基不固,弊窦滋生,几难收拾”等等。徐润本想以产契作为抵押,向亲友多方借贷,将欠款照数结清。但要张罗齐这笔巨款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他恳求盛宣怀“代为陈情,暂准宽限期”,并“代为乞恩……免其置议”。

然而,盛宣怀正是要借此机会一举将徐润逐出招商局,结果是既未等到徐润抵借款项照数结清,也未为其乞恩“免其置议”,而是根据盛宣怀个人的汇报,李鸿章上奏朝廷,说徐润等“假公营私、驯至亏欠局款,实属瞻玩”,最后给予徐润革职的处分,令即照数抵赔亏欠的局款。徐润又提出他在局11年间,仅领取薪水2.5万两,局中存有各项余款六、七十万两,他照章可提取二成花红,但从未有所沾润,而其他会办历年所撮的漕佣、水脚余利等均不在少数,据此亏欠局款之数可否酌让。他的这个请求也遭到断然拒绝。

这段时间里,唐廷枢恰好出国考察局务、船务,在欧洲各国游历,无法替徐润开脱罪责。徐润在朝中又没有强有力的靠山,无人庇护,盛宣怀又落井下石,他不仅被革除了招商局会办、开平矿务局会办的职务,而且财产方面也损失惨重。

盛宣怀将徐润逐出招商局以后仍不放心,还想彻底搞垮他以绝后患。徐润在十六铺一带黄金地段置有两处地产,共有六、七亩,均已建筑房屋,每年可租银3400余两。盛宣怀担心徐润日后东山再起,会在这里设置码头、购置船只,重操航运业与他竞争,便借此机会,采用强硬手段迫使徐润将这两段地产卖给招商局,并且将价格压至最低,只付价银1.6万两,而该产业的

实际价值达四、五万两。后经好友活动,补付价银1万两。

徐润被革去招商局会办之职后,唐廷枢仍是招商局的总办,盛宣怀又通过李鸿章借故将唐廷枢调离招商局,北上专营开平矿务局。唐廷枢于1885年春夏间离局,盛宣怀8月份就当上了多年梦想的督办职位。

到1891年,徐润抵赔给招商局的股票和房地产,赎的赎,卖的卖,亏欠局款一案了结,并获准解除“参革”。不久名为招商局会办实为总办的马建忠因故离开招商局,有人便极力向盛宣怀提议让徐润担任总办,认为总办一职非徐莫属。但盛宣怀岂能容得徐润东山再起,断然拒绝道:我和徐润“两人不能再合”。

1901年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发展自己的实力而谋求财源,他看中了盛所控制和经营的洋务企业,尤其是赢利稳操胜券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于是便依仗权力从盛宣怀手中接管了电报局和招商局。盛宣怀竭力抵制,并在招商局保存了很大的势力。1903年,袁世凯委派离开招商局已经有20年之久的徐润重新担任会办一职。1906年原招商局总办杨士琼调京,袁世凯又委任徐润代理总办。袁世凯的目的,是想通过徐润从盛宣怀手中夺取对招商局的控制权,徐润也很想替袁世凯出力,任职期间,他积极筹划添置轮船,添建和翻造栈房等等。但是袁世凯并不信任他,不久他便遭到袁世凯的怀疑,最终于1907年被解除代理总办的职务。此后数年间,怀才不遇的徐润一直赋闲在家。1911年2月9日,卧病在床一年有余的徐润在上海的寓所去世,终年74岁。

徐润在中国工商界闯荡几十年,其经历既十分丰富,又充满坎坷。徐润是中国近代私人企业的首创者之一。他早年曾在各处创办许多茶号,经营各种农副产品;70年代初,他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20世纪初,他在上海创办景纶衫袜厂,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私人企业之一,该厂在民国初年还一直由徐润的子孙经营。徐润还是洋务运动的马前卒。他应李鸿章之邀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并为招商局的早期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在招商局任职期间,他还先后创办并经营了池州煤矿、永平煤矿、开平煤矿等,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从徐润起伏跌宕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艰辛历程。

1931年2月7日深夜,上海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响起了口号声和枪声,倒在血泊中的革命青年里就有“左联五烈士”之一、21岁的诗人殷夫。

1991年2月8日早晨8时,台北三军总医院里一位96岁老人病逝,他是国民党前国防大学校长徐培根上将。

徐培根正是殷夫的同胞大哥,兄弟俩以不同的方式走完了人生之路,而他俩相隔60年的卒时日却是如此的接近,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殷夫的大哥徐培根的经历曾被列为“禁区”,现根据已有的资料,试叙之。

陈独秀是他的史地老师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九,浙江省象山县东乡大徐村里有一个男孩呱呱坠地,全家上下都好生欢喜,因为在这之前已有一个女孩(徐祝三)。男孩取名徐芝庭(徐培根),以后又有一个妹妹(徐素云),三个弟弟。他们兄弟四人以芝、兰、松、柏为序命名,殷夫(徐柏庭)最小。

徐培根的父亲叫徐孔甫,饱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但出身寒门,未能跻身仕途。于是他另治医学,擅长妇科、儿科,颇有良医名声。他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于是天资聪敏的徐培根进入全县最高学府——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毕业时,他获得全校第一届毕业生中品学兼优的第一名。当时入学者年龄相差甚大,毕业时平均十八九岁,而徐培根跨出校门年仅14岁,足见他当时才华过人,成为该校的学生楷模。随后他考入宁波师范,然而未读完一学期,便弃学从军,考入杭州陆军小学,成为他的人生一个转折点。

设于各省省会的陆军小学(前身武备学堂),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共招了六期。招生对象是高等小学毕业生,14岁至25岁青年,各省名额80名至120名不等。学制三年,教育内容:修身、经、史、地、国文、法制、外国语文、博物、数、理、化等,另外还要学习军事学科内容: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弹道学等。徐培根在校时间应是1909年底或1910初到1911年,这期间学校来了一位以后赫赫有名的“五四总司令”——陈独秀。

1909年底,陈独秀从东北南下杭州,与高君曼同